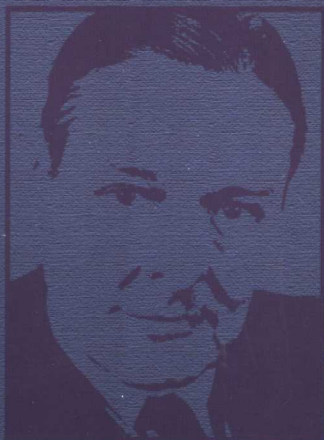


北京外国语大学2005年学术著作系列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T. S. Eliot:
A Reading of His Poems and Plays

T. S. 艾略特：
诗歌和戏剧的解读

张剑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T. S. 艾略特: 诗歌和戏剧的解读 / 张剑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600-6050-1

I. T… II. 张… III. ①艾略特(1888~1965)—人物研究 ②艾略特(1888~1965)—诗歌—文学研究 ③艾略特(1888~1965)—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K837.125.6 ②I7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3236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蓝小雯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6050-1

定 价: 13.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前言

T. S. 艾略特 (1888—1965),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英国的“荣誉勋章”、德国的“歌德·汉萨奖章”和意大利的“但丁金奖”获得者, 是英语诗歌界“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在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诗歌已被翻译成几乎所有欧洲文字; 世界各地在他有生之年里所出版的关于他的专著和文章的数量超过了以前的所有英国作家; 他是西方现代派的创始人, “奏响了现代派的黄钟大吕”; 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 他被称为“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带领人”和“20 世纪英语世界最为重要的批评家”; 英国的一项诗歌大奖“T. S. 艾略特诗歌奖”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我国有研究他的作品专门学会“全国庞德—艾略特研究会”。他在西方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他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两代诗人, 他改变了英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看法。这样一位重要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我国有着广大的读者群。

在西方, 艾略特研究已经比较透彻, 关于他的研究著作可以装满一个小型图书馆。随着他的作品在 2015 年超出版权保护期, 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始资料将解密。这必将引起新一轮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在我国, 艾略特的研究历史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了。几乎所有艾略特的诗歌都被译成了中文, 他的最重要的文论著作也都译成了中文, 在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成就应该说是

小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研究多集中在艾略特最著名的几首诗歌上，即《J. 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和《四个四重奏》，并且我们的专著数量还有限。就现有成就来说，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要让更多的人读艾略特的作品，那么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难”字。他的作品有引经据典、缺乏叙述连贯性等特点，因此一般的读者需要有一个引导或指南。让读者轻松地读懂艾略特的作品，并且对作品产生兴趣：这是本研究成果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本研究成果以艾略特一生的经历、观点和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和文学批评）为基础，对诗人作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全书从艾略特的个人经历出发，阐述他的诗歌和戏剧的特殊意义。艾略特一贯坚持诗歌的“非个人化”，致使早期的艾略特评论避而不谈他的个人经历。其实，“非个人化”的理论只是一个烟雾弹，诗歌和戏剧后面的作者经历才是这些作品的创作源泉。把艾略特的生平和著作结合起来可以给我们的理解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它能使我们看到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新的意义。

本研究成果的十三章中，有七章已经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在以下杂志上发表过，在这里列一个清单以对这些杂志表示感谢：

第一章，《外国文学评论》

第二章，《外国文学评论》

第三章，《外国文学》

第四章，《当代外国文学》

第五章，《国外文学》

第六章，《外国文学》

第八章，《外国文学研究》

本研究成果最后附加了“T. S. 艾略特研究中文出版目录”，它包括了从 1980 年以来的书籍和文章。这是一个精选目录，有些筛选和取舍，但是它基本上代表了艾略特研究在我国的主要成果。或许它对以后的研究者有一定的帮助。

本研究成果是作者多年来对艾略特作品研究的结晶，也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讲授研究生课程的总结。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要感谢社科院盛宁教授在项目早期对作者的指点；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张中载教授、陈恕教授、李品伟教授和北京大学刘锋教授审读本书的书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感谢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当代外国文学》张子清教授、《外国文学》李铁教授、全国庞德—艾略特学会吕文彬教授为中期成果的发表提出意见；感谢湖南师大蒋洪新教授赠送他的著作，为本书提供了参考。本书的成绩和优点与以上各位的帮助分不开，但如果有所不足和缺陷，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本研究项目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批准号：94CWW003）的资助，成果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对两个基金表示感谢。

作者

2006 年 6 月 25 日

目 录

第一章 “现存秩序必须改变”：艾略特评论史述评	1
第二章 《J. 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被钉在墙上挣扎”	27
第三章 《枯叟》：“干枯头脑的思索”	38
第四章 《荒原》：“有节奏的牢骚”	48
第五章 《空心人》：“死亡的梦幻王国”	72
第六章 《圣灰星期三》：“古老的激情”	82
第七章 《烧毁的诺顿》：“旋转世界的静止点”	98
第八章 《东科克》：“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	108
第九章 《干赛尔维吉斯》：“哪里是尽头？”	121
第十章 《小吉丁》：“时间与永恒的交汇”	130
第十一章 早期戏剧：“更高的感情强度”	138
第十二章 后期戏剧：“对社会有用的诗人”	152
第十三章 “非个性化”：艾略特对感情的逃避	168
T. S. 艾略特研究中文出版目录	181

第一章“现存秩序必须改变”：艾略特评论史述评

艾略特在《传统和个人天赋》中写道，“没有诗人，或从事任何艺术的艺术家的，能够独自拥有完整的意义……一部新的作品出现时所发生的一切也会同时发生于这部作品之前的所有作品。现成的文学巨作相互间已形成了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将随新作品的加入而改变。在新作品到达之前，现存秩序是完整的；为了使这个秩序在新作品强行进入之后延续下去，现存秩序必须改变，即使这改变是微小的”^①。这段话虽就普遍现象而言，但用在艾略特身上也非常贴切。他的到来改变了英国文学的现存秩序，他通过诗歌和文学批评改变了一代人的文学趣味，创立了一整套新的鉴赏标准。他的诗迫使人们重新认识英国诗歌发展史，迫使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 17 世纪的玄学诗派、弥尔顿和浪漫主义。同时他的作品更加深了人们对法国 19 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认识，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借鉴别国诗歌的巨大可能性及其对本国诗歌发展的重要作用。艾略特把继承传统和个人创新相结合，振兴了 20 世纪的英国诗歌，使当时萎靡不振的英国诗坛重新充满了旺盛的生机。但是作为一名“先锋”诗人，艾略特有一个艰苦创业的历程。在没有现成道路的情况下，一个创新者必须披荆

^① Eliot, *The Sacred Wood* (London 1920), p.50.

斩棘，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艾略特批评史正好反映了这样一个艰苦创业的历程。

一 “刻意震惊和迷惑”

艾略特早期的诗歌在伦敦不为文学界所接受，甚至受到蔑视。1914年，他到达英国的时候，无处愿意发表《J. 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当他的朋友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把此诗推荐给编辑兼出版商哈罗德·门罗（Harold Monro）时，门罗认为它“完全不正常”^①。后来，庞德（Ezra Pound）又把它推荐给芝加哥的《诗刊》杂志，称之为他“近年来所读到的最好的诗歌”。其编辑哈丽特·门罗（Harriet Monroe）同意发表这首诗，但要求艾略特修改或删除其中有关哈姆雷特的片段。在艾略特执意不肯的情况下，《诗刊》才在1915年照原样发表。^②然而在伦敦，打开局面仍然艰难。1916年，庞德出版了他自己编辑的《泛爱诗选》（*Catholic Anthology*），其中收进了艾略特这首诗和叶芝（W. B. Yeats）、温德翰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等人的诗歌近作。英国评论界群起而攻之，艾略特似乎被特意选为攻击对象。亚瑟·沃（Arthur Waugh）斥责艾略特为“醉奴”，认为他只是一个反面教材，给当今诗歌界敲响了“警钟”。1917年，艾略特的第一本诗集《普鲁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发表时，他所受到的评论更加严厉。《新政治家》杂志的一篇未署名文章认

^① Conrad Aiken, *Ushant* (Boston), quoted by Peter Ackroyd, *T. S. Eliot* (London 1985), p.55.

^② Ezra Pound, *The Letters of Ezra Pound*, ed. D. D. Paige (London 1951), p.92.

为，对艾略特这些诗歌只能一笑置之，说作者未把它们称作诗歌是“公正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员同样否认这本集子为“诗歌”，并称其中既无特殊灵感，又无真实感情，读后不会给人任何“快乐”。《文学世界》的评论员认为天才是允许在朋友面前出丑的，但他决不会在自己的圈子以外这样做，“艾略特先生没有这样的智慧”^①。

从这一小小的风波，我们不难看出评论界最初对艾略特的评价，也不难看出艾略特早期诗歌对当时文坛的冲击。他的诗歌背离传统的写法，结构松散，叙述不连贯，常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在时空上前后跳跃。早期的艾略特只有庞德、艾肯、路易斯、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和 J. M. 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等少数支持者，他的读者范围也很有限。对他的反对者来说，他的诗歌只是一个“叛逆”，不必认真对待，而对他的朋友来说，艾略特则是新诗的杰出代表；对前者来说，他仅仅是像写价目表似的堆砌名词，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心理现实主义”的表现；对前者来说，艾略特卖弄“聪明”，充满了无所关联的比喻和奇想，而对后者来说，艾略特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反讽（irony）和一语双关（ambiguity）；对于前者来说，艾略特是“刻意震惊和迷惑他人”，而对后者来说，这正说明了艾略特的大胆创新。

1922 年发表的《荒原》在结构、比喻、用典等方面更加大胆、更加新颖。它集东西方文明于一炉，把整个人类文化传统微

^① See Michael Grant (ed.), *T. S.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1982), p.69; p.75; p.74.

缩于 433 行诗中。它毫不预示地从一个场景移到另一个场景，从现代回到古代，又重新回到现代。这些繁琐的典故和时空的跳跃是对习惯于传统诗歌的读者的更大挑战。路易斯·昂特梅耶 (Louis Untermeyer) 称它为“炫耀学问的招摇过市”，它给我们一个万花筒似的景象，“在里边彩色的碎片无法弥补整体意图的欠缺”。J. C. 斯乖尔 (J. C. Squire) 在绝望中放弃了阅读《荒原》的尝试，他在里边发现了“一连串单调并且不断变换的场景，而这些又穿插着对文学史的回忆，过去诗人的名句，以及相互脱节的叫喊”。J. C. 兰森姆 (John Crow Ransom) 发现此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极端不连贯性。“我们一般不会一口气或在同一心境中引用希腊悲剧和现代下层社会的语言，我们从‘哦哦哦哦这莎士比亚式的爵士乐’读到‘平安’时不能不感到心悸”。他认为艾略特把这些迥异的素材相提并论无法达到逻辑上的“综合”^①。

这些争论的焦点当然在于《荒原》是否有一个统一全诗的系统、是否有一个总体的构思。这要看读者是否能够从此诗的“碎片”中找到一个综合的模式，也要看读者是否愿意采纳此诗所需要的新的阅读方式。埃德蒙·威尔逊 (Edmund Wilson) 认为《荒原》在它的残片后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构架，艾略特在杰茜·维斯顿 (Jessi Weston) 对亚瑟王传奇的重新解释的基础上，用历史来烘托现实的感受，写出了现代人的空虚、厌倦和灵魂对解救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艾略特先生的琐碎比他人的史诗更有价值”。康拉德·艾肯承认《荒原》在叙述上的不连贯，但他认

^① See Michael Grant (ed.), *T. S.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1982), p.151; p.192; p.177.

为艾略特把这一不连贯性变为了一个优势。这首诗属于一个“象征的层次”，可以说它的“意思”没有明显地或准确地被表达出来，但是它在“感情上的价值远比它在逻辑上的价值更清晰、更丰富”。艾略特是在用文字创造一种“标题音乐”。同样，I. A. 理查兹 (I. A. Richards) 认为评论界极力重建《荒原》的“思维线索”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此诗的逻辑并非理念上的前后一致，而是感情上的统一。互不关联的段落在读者心中激起类似的情感，从而它们的效果“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感情整体并导致意志的解放”^①。

可以说，最初的《荒原》评论是不成熟的。对于那些把它视为一堆“废纸”的人，我们只能一笑置之，然而，立足于象征主义和心理学的评论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威尔逊似乎夸大了艾略特诗歌对时代的反映，在这一点上，诗人将予以亲自否认。理查兹把读者的心理误解为诗歌的实体，抬高诗歌的效果，以致完全否认了它所表现的内容。这些都给后世的评论留下了新的可能性。但这些有影响的批评家的著述显然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艾略特的认识。可以说是这些人开拓了文学界对艾略特的理解和兴趣。连艾略特的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荒原》含有优美动听的诗句，“否认它包含着灿烂的成分和极端美妙的诗行的人将是非常愚蠢的”。同《普鲁弗洛克和其他观察》相比，这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变化。现在的艾略特已不是 1914 年那个默默无闻的美国人，他已成为伦敦诗歌界的风云人物。

^① See Michael Grant (ed.), *T. S.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1982), p.143; p.160; p.237.

《荒原》以后，艾略特的诗歌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形式上也有相应的改变。如果《荒原》已经给人一个模仿音乐的印象，那么《四个四重奏》就是有意识地创造音乐效果的尝试。J. G. 弗莱切 (John Gould Fletcher) 认为，“《四个四重奏》的题目就直接暗示着一种音乐结构……而正是在这方面，我发现艾略特的成就给人印象最深”。艾略特运用室内音乐中的“主题与变奏”、“对位效果”等手法，用不同节奏的诗段表现同一主题，把优美抒情的诗行与口语化的诗行相对照，然后通过对比重复又回到主题，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梅耶认为，“在结构上《四个四重奏》是非常出色的，它展示了一个又一个的总体设计”^①。艾略特不但在每个四重奏中描写一个意义非凡的地点，而且将它们与四个季节和四种元素（空气、土壤、水和火）对应起来，描写这四种元素所构成的物质世界与他所追求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对生与死的意义。

同艾略特其他诗歌一样，《四个四重奏》也引起了评论界的争论。玛尔科姆·考利 (Malcolm Cowley) 认为艾略特为了精神目标竭力压制感性和为诗歌提供素材的自然世界，这造成了他的“诗无足轻重”的观点和诗中那些意义贫乏、抽象和隐秘的段落。他认为评论界无法恭维那些口语化的无韵诗部分，它们写成散文或许更容易上口，因为它们读上去像选自某“神秘哲学手册”。德尔摩·施瓦兹 (Delmore Schwartz) 也表明他对此诗的崇拜不是毫无保留的。某些白话诗行，如“水果、杂志、公函”，“甚至一顿美妙

^① See Michael Grant (ed.), *T. S.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1982), p.574; p.577.

的晚餐”都标志着“诗人的感性的松弛”。虽然施瓦兹承认此系列中的那首“六节六行诗”(sestina)和那段模仿但丁的“与诗歌前辈之会”激起了他的惊喜和崇敬,但其他部分在意象和措辞上的选择(如“整个大地是我们的医院/一个破产的百万富翁建造的医院”)缺乏《荒原》首句所具有的那种永恒的新奇和独特。^①

不过,类似的批评家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诗人在《四个四重奏》中的特殊意图,因为,像音乐一样,一首长诗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感情的高强度。音乐有它的快板和慢板,诗歌也有它的感情的起伏:有强烈的抒情,也有平淡的过渡。^②如果他们懂得艾略特对音乐模式的追求,他们也就不会发表上述议论了,而可能从其他角度来分析诗中感情变化的规律。在这一点上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比他们明智。他指出《干塞尔维吉斯》的确有突出的毛病,它不单在尾韵的运用上牵强附会,而且整首诗的调子与其他几首不协调。因此,他认为第三首四重奏是一个失败,但他又指出这个失败可能是故意的,是整个系列感情变化的需要。艾略特在第一、二首四重奏中展示了生与死、时间与永恒的矛盾,在第三首中这个矛盾没有达到统一,或者说只获得了一个虚假的统一,而在第四首中才真正达到统一。这就是说,不仅在韵律上,而且在意义上,这首诗歌都有音乐的起伏。^③

其他争论来自于对艾略特诗歌选题的怀疑。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艾略特的后期诗歌,特别是《干塞尔维吉斯》

① See Michael Grant (ed.), *T. S.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1982), p.566; p.568.

②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London 1957), p.32.

③ See Michael Grant (ed.), *T. S.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1982), p.566; p.568.

的批评完全出于他与艾略特思想意识的差别，因为他认为当今的教会不但没有任何新鲜的意象和词汇可言，而且要求它的成员接受荒唐的教义。他把后期诗歌的问题归结为“艾略特先生的题材的退化”^①。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同样对艾略特的题材感到失望，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他认为诗歌是有一定界限的，它不应该超出它自己的范畴而成为别的思想的宣传工具。否则，它就不再是诗歌了。他发现《东科克》的宗教和哲学思辨已经超出了诗歌的界限，所以“艾略特写了一首不全是诗歌的诗歌”^②。

对《四个四重奏》的评论是复杂的，但从正面对它的分析和解释远远超出对它的诋毁。五花八门的评论似乎已被人们忘却，卡尔·夏皮洛（Karl Shapiro）对这组诗歌的评价（认为它是“诗艺完全消失的证据，诗歌破产的承认”）早已贻笑大方。在当今的评论界被引用最多的可能要算 J. J. 斯温尼（James Johnson Sweeney）对《东科克》和《小吉丁》的解释和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对整个系列的评论。艾略特认为《四个四重奏》是他最得意之作，而且每一首都比前一首强。^③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与作者的感觉苟同，但可以说在当今的西方评论界，它已基本上被公认为现代诗歌的杰作。至此，艾略特诗歌不但赢得了评论界的肯定，而且受到了很高的评价。1939 年，叶芝去世后，艾

① Bernard Bergonzi (ed.), *T. S. Eliot: Four Quartets, a casebook* (London 1985), pp.153-157; pp.245-246.

② Ibid.

③ Reported by Helen Gardner, *The Composition of Four Quartets* (London 1978), p.4.

略特无形中成为当时英国诗歌的头面人物。评论界对他的关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他的声望也比任何时候都高。在以后的 20 多年里，他被授予了英国的“荣誉勋章”，德国的“歌德·汉萨奖章”，意大利的“但丁金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到 1965 年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诗歌已被翻译成几乎所有欧洲文字，在他有生之年里所出版的关于他的专著和文章的数量超过了以前的所有英国作家。他已成为英国诗歌界“最有影响的诗人”。

二 文学批评的反弹

艾略特得到文学界的承认和理解，并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一颗诗歌明星，还因为他从 1917 到 1930 年间，在发表诗歌的同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轰动效应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让评论界震惊的理论。1917 年，他提出诗歌的“非个人化”，反对华兹华斯关于诗歌来自“平静中记起的情感”的理论；1919 年，他通过对《哈姆雷特》的研究，提出了感情的“客观对应物”的理论；1921 年，他公开反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内心声音”，认为诗歌必须附属于外在权威，接受传统的约束；同年，他提出了“思想的感性化”理论和“感性脱节”的理论，指出英国诗歌在莎士比亚时期和 17 世纪能把思想和感情融合在一起，而从弥尔顿开始，思维和感性的分离造成了英诗的堕落，以致到 19 世纪后期在乔治时期的诗人手里成为空洞无物的纯粹宣泄情感的工具。^① 1933 年，

^① Eli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1932), pp.19-20; p.145; pp.26-28; pp.286-288.

他称雪莱的思想含混不清、观点极端幼稚，像“一个伶俐的和富有激情的小学生”^①。1937年，他又将拜伦降低为一个出色的故事讲述人，一个“苏格兰诗人”，称他只能成为“小学生的崇拜对象”^②。

这些观点有效地将艾略特变成一名浪漫主义的叛逆者，其实，他只是顺应了当时的一个潮流。曾在哈佛大学哲学系攻读的艾略特在1910年以前就熟悉他的老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反浪漫主义专著《卢梭和浪漫主义》；1914年到英国以后，他又了解到T. E. 休莫（T. E. Hulme）的长文《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艾略特曾经留学的法国，也有从浪漫主义回归古典主义的呼声。只不过艾略特将反浪漫主义全面运用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并且给予它以更有力、甚至更尖锐的表达方式而已。有趣的是他却成为了当时反浪漫主义的核心人物，给英美批评界以重大的和深远的影响。早期的有一定分量的现代诗歌评介综述，如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梭的城堡》、F. R. 利维斯（F. R. Leavis）的《英诗的新方向》和克里恒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现代诗歌和传统》都认为现代文学与19世纪背道而驰，并把艾略特在内的现代诗人看作英国诗歌的新开端。这些观点不可能与艾略特的理论和影响无关。

1920年，艾略特收集他早期的论文，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论文集《圣林》。它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诗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有它自身生命的”，它所表达的内容与一堆有关作者生平的

① Eliot, *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London 1934), p.88.

②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London 1957), p.196.

资料是不同的，它所包含的感情和见解也与作者自己的感情和见解不同。第二，文学批评必须尊重诗歌的自身独立性和完整性，“必须把它首先看成诗歌，而不是别的东西”^①。文学批评不能超出诗歌的范围而沦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传记等等。这两个观点降服了当时的评论界，使《圣林》成为了许多人的《圣经》。可以说这两个观点概括了 3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批评”的所有著述，阿伦·泰特（Alan Tate）、克里恒斯·布鲁克斯、R. P. 布莱克默（R. P. Blackmur）和 J. C. 兰森姆都以不同的形式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或对之进行过发挥和发展。“新批评”把诗歌神秘化，把它视为“有机体”，不能分析，不能改写。而文学批评只能在不损害诗歌“生命”的情况下，对诗歌进行“仔细阅读”（close reading）^②。艾略特和“新批评”给评论家画了很多框框，对诗歌的疑难问题，评论家不能到诗人生活里去寻找答案。这样，他们的手脚被束缚住了。

四、五十年代的艾略特评论普遍受制于他自己的观点。F. O. 马修生（F. O. Matthiessen）的《T. S. 艾略特的成就》认为艾略特作为诗人评论家，将跻身于德莱顿、约翰逊、柯尔律治和阿诺德的行列。他的成就在于用诗歌和文论使批评界重新认识到诗歌的本质。“浪漫主义批评家的兴趣总的来说不在诗人的作品，而在作品后面的人。人文主义和社会学批评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意欲避开对诗歌本身的评价，而专注于诗歌所起源的社会背景”。马修生希望通过介绍艾略特的诗歌改变这种“日益严重的将诗歌

① Eliot, *The Sacred Wood* (London 1920), p.viii; p.x.

② See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1983), pp.46-51.